

毛泽东诗词中典故的文化翻译^①

曾 清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公共外语教学部,湖南 长沙 410205)

摘 要:典故的翻译对毛泽东诗词的翻译至关重要。毛泽东诗词典故可分为神话、寓言、人名等类别。从文化翻译的角度,对比分析四种《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典故译文,可发现汉语诗词典故翻译的某些规律与经验。

关键词:毛泽东诗词;典故;文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0)05-0130-04

On the Translation of Allusions in Mao Zedong's Poems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ZENG Qing

(Public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Department,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205)

Abstract: Appropriate treatment of the allusion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translation of Mao Zedong's poems. The allusions in Mao Zedong's poem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myths, fables and nouns about persons, etc. After comparing four representative English versions of Mao Zedong's po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certain rules and methods could be found in the translation of allusion of Chinese poems.

Key words: Mao Zedong's poems; allusion; cultural translation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也是中国当代的杰出诗人,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关于毛诗的研究和翻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诗词是汉语语言特点的典型体现,典故则是中国文化的浓缩和精华。毛诗的一大特点就是大量引用典故,古典今用,古今愈合,以故为新。因此,研究毛诗的翻译,就必然要研究其中典故的翻译,而典故所蕴涵的丰富的文化背景,则是在翻译时不得不重视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诗词的翻译,也就是文化的翻译。

一、毛泽东诗词中典故的类型

毛泽东在他公开发表的50余首诗词当中,得心应手地运用典故达80多处(重复出现的不计)^[1]。诸如吴刚砍桂、嫦娥奔月、共工触山、鲲鹏展翅、霸王自刎、巫山神女等,这些五彩缤纷的典故,在诗人

的笔下运用得活灵活现,在作品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突出题意的作用,这对于诗词含义的表达和古典文化的传播意义重大。具体来看,包括有来历出处的词句、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以及历史名人等三大类。

(一)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和句子

毛泽东诗词中巧妙地运用了古典诗词中的经典词句等,并赋予其新意,为其诗词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例如:《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天若有情天亦老”是由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借用而来的;“宜将剩勇追穷寇”改变了《孙子兵法》中“穷寇勿追”的说法,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把敌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掉,不要留下后患。《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落花时节读华章”化用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落花时节又逢君”。《浣溪沙·

^① 收稿日期:2010-05-25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实现有效文化传播的翻译策略研究”(09C234);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毛泽东诗词中的文化图式及其翻译策略研究”(10C0545)

作者简介:曾清(1979-),女,湖南常德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公共外语教学部助教,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和柳亚子先生》的“一唱雄鸡天下白”是化用李贺《致酒行》的“雄鸡一唱天下白”句表新意。《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蚍蜉撼树谈何易”化用了韩愈《调张籍》一诗中的“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类似的典故在毛泽东诗词中为数不少,他都能信手拈来,使用恰到好处,毫无生硬之感。

(二) 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

毛泽东运用民间或神话传说、寓言故事、民间谚语、历史故事等达到了十分娴熟的地步,借此来创造独特的艺术形象,表现现实生活及个人感受。例如《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不周山下红旗乱”中借用了神话中共工头触不周山的故事;《蝶恋花·答李淑一》中“忽闻人间曾伏虎”引用的是《续高僧传》卷十六中记载的佛教故事,中国民间也有伏虎的传说;《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借用《西游记》的故事,寓现代政治于古代神话中;《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蚂蚁缘槐夸大国”借用了唐李公佐小说《南柯太守传》中的故事;《念奴娇·鸟儿问答》中多处用到动人的寓言故事和美丽的神话传说,如“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中“鲲鹏”和“蓬间雀”借用了《庄子·逍遥游》里的寓言;“仙山琼阁”指的是古代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这些典故的运用各具情趣,富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三) 历史名人

毛泽东在诗词中不仅引用了神话和文学中的人名和地名,也引用了历史和现实中的人名和地名,如:飞将军、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唐僧、一枕黄粱的卢生、怒触不周山的共工、沾名的霸王、挥鞭的魏武、躬耕桃花源的陶渊明、九嶷山上的帝子、奋起千钧棒的孙大圣等。这些引用随心所欲,信手拈来,给人以直观、形象的感觉,但往往又不拘原意,而是结合现实,创造新意。如:《清平乐·蒋桂战争》中,“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毛泽东用人们熟知的一枕黄粱的卢生来讽刺发动新的军阀战争的蒋介石,他的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不过是又一场黄粱梦而已。

二、毛泽东诗词中典故的译法及其要点

(一) 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本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毛泽东诗词开始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广泛流传。本研究基于以下四种较有代表性和获广泛赞誉的英文译本^[2-5],简况如下:

外文出版社译本(1976年,北京,外文出版社):是集体合作的结果,1976年5月1日,英译本由外文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1999年3月,外文出版社

又出版了此书的汉英对照本。

赵甄陶译本(1992年,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译本包括韩素音所写的前言及译者自己的前言、42首译诗以及英语注释(Notes),附录收入译者撰写的文章《谈谈毛泽东诗词英译本译文中的几个问题》(原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2期)。译诗采用汉英对照的形式。

黄龙译本(1993年,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译本包括译者自序、50首译诗,以及部分毛泽东诗词手写以及几幅彩色插图。译诗和注释均为汉英对照。

许渊冲译本(2006年,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译本包括孙东升写的序以及毛泽东诗词中精华的67首。序和译诗全部采用汉英对照的形式,书中还配有大量的插图。

(二) 毛泽东诗词中典故的翻译方法

结合前面对毛诗中典故的分类,我们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出发,通过比较分析以上四个有代表性的译本中典故的翻译,归纳出典故的三种翻译方法(由于篇幅的限制,无法引用译者的注释,部分内容省略)。译文前的阿拉伯数字代表不同的版本:1代表外文版,2赵甄陶版,3黄龙版,4许渊冲版。

1. 直译。在翻译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句子时,以上四个译本大多数采用了直译的方法。选择直译法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方面,由于典故负载的文化信息通常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长期沉淀的民族心理,而直译法有利于保留汉语典故的这种文化特色,尽可能多地向英语读者传播汉语文化,有利于英汉文化交流与融合,并能丰富译文语言的表达力;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诗词中引用的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句子较多,采取直译加注或意译的方法会有点累赘,也容易给读者造成理解障碍,因此,对于这一类典故,多数译者采用直译。

例如:“帝子”译为 the Princess,将“金猴”译为 Golden Monkey,将“天若有情天亦老”译为 Heaven would have grown old were it moved to emotions,等等。这样翻译基本上不会影响译文读者理解原诗的意思,从译文本身来讲,也比较流畅,可读性强。

2. 直译加注。在翻译神话传说、寓言故事时,以上译本大部分采用了直译加注的方法。直译加注的方法可以看成是对直译法的补充,因为有些典故如果采用直译的方法,会对译文的读者理解带来很大的障碍,可能会让他们觉得不知所云,因为他们不具备相应的汉语文化背景,也不熟知相应的汉语典故。而如果采用意译的方法,对译文读者来说,虽然从理解上会比较容易,但是却失去了汉语

典故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丧失了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目的。因此,对于此类典故宜采用直译加注的方法。对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类典故时,由于此类典故暗含的文化内涵丰富,采用直译加注的方法翻译,更好地传达原诗的意境,多数译者采取了直译加注的方法。

例如:“不周山”译为 Puchou 和 Mt. Buzhou,“一枕黄粱”译为 pillow - cherished Millet Dream。也有译本将“一枕黄粱”译为 dream of rule in vain,这样西方读者读起来会很容易理解,但是却失去了一个了解汉语典故的机会,从传播文化的角度看,有些遗憾。

3. 音译加意译。在翻译人名时,上述四个译本绝大部分采用了意译加音译的方法。对于人名来说,音译当然是通用的方法,但是典故中的人名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已经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成为象征性和暗示性极强的符号,此时再仅仅采取音译则会失去很多隐含的信息。而音译加意译,就相当于是在翻译人名的同时给出了一个其指代含义的说明,可以让英语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个人背后所包含的文化信息以及在诗中的作用。因此,这是翻译中国典故中人名理想方法^[1]。

例如《登庐山》一诗中的“陶令”一词,外文版译为 Perfect Tao Yuanming,似乎没有抓住陶渊明的特点;而黄龙版译为 Magistrate Tao,则属于直译,因为陶渊明做过县令;此外,许渊冲版译为 poet Tao,则突出了陶渊明作为诗人的文化特点。考虑到本诗的写作背景,可以发现这不是一般的登山吟咏诗作,而是毛泽东领唱的创建人类理想社会的雄壮进行曲和声音激越的时代导航歌。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诗人陶渊明,曾经登过庐山,他在庐山脚下做官,又在庐山脚下辞官归乡,他在当时为苦难的民众,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压迫和战争苦难的桃花源式的人间仙境。而毛泽东在庐山观景,既对眼前的自然景观有所感触,又对庐山包括陶渊明故地在内的人文景观有所感触,从而把自己对现实的审美体验和对历史的审美体验交汇起来。因此本诗里的陶渊明有明确的文化内涵和与现实的对比意义,而赵甄陶版译为 poet - hermit Tao,尤其是这里的 hermit,则充分地表达了诗中陶渊明的指代含义和对比效应。

(三)毛泽东诗词中典故翻译的两个要点

通过以上对几种有代表性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中典故的翻译方法研究,可以发现这些方法及适用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和生搬硬套的,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很强的过程,而对于诗词的翻

译,还要考虑原诗的格式、音律、意境等方面的因素。从文化翻译的角度来看,有以下两个要点值得注意:

1. 要注意译文的前后对应。汉语诗词的特点是精练浓缩,用词讲究推敲,同一事物尽量不用同一词表示,以免重复,失去美感。相应地,在翻译的时候也需要注意译文的前后对应。如:《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中的“金猴”和“孙大圣”两词,虽然中文名称不同,但所指相同,这一点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可以理解,但是西方读者未必明白其中的关系。因此,英译文最好也能反映出原文的这种联系,即一方面要保持两个英译名词前后的一致性,保持两者之间的“语篇衔接”,使英译“金猴”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词汇,重复出现于“孙大圣”的译文中。从这一点看外文版和黄龙版的翻译做得不好,两词的翻译没有相同之处,从而使得西方读者不知道 Monkey King 和 Sun Wukong 或 St. Sun 指的是同一个人物。而赵甄陶版和许渊冲版则有一个共同的词“Monkey”,可以给读者一个明确的信息,了解其中的关系。而另一方面两者的译文又不能完全相同,因为它们们在诗中所处的位置和含义不同,这一点也要在翻译中体现出来。由此,译文读者便可知“金猴”和“孙大圣”这两个名词既同中有异,又异中有同,既是同一指向,但强调的重点又有所不同。《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尾联是全诗的主旨,诗人热情洋溢地为之欢呼,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向孙大圣学习,学习他坚定的革命立场,学习他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这也是与诗中的“妖雾”所对应的。从这一点看,许渊冲的译本“ever - victorious”直接明确地体现了这种敢于斗争并且取得胜利的文化内涵。而赵甄陶版“Heaven's Rival”似乎着重翻译“大圣”这个与天宫和玉帝对抗的角色之本意和由来,在英语看来就是与天堂和上帝斗争,而这是与“妖雾”的指代是不同的,恐怕也不是诗人的本意。

2. 要注意典故的指称意义与语用意义决定了直译与意译的选择。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家 C·W·莫里斯区分了符号学的三个方面,即语言符号(verbal sign)具备三种意义:指称意义(designative meaning)、言内意义(linguistic meaning)和语用意义(pragmatic meaning)。而典故词语主要载负着三类符号学意义中的指称和语用两类意义,由于文化的差异,典故的指称意义只存在于该语言的文化背景中,有着浓重而形象的文化色彩,成为上下文中最突出的意义。同样,在特定的文化中使用某些典故总是有着各自的语言风格特色或某种目的,因而语

用意义有可能成为上下文中突出的意义。由于受到语境因素的制约,典故的两类意义都可能成为某一上下文或具体情景中的突出意义。翻译时,在形象和喻意即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的保留上译者却不可一律对待^[6]。译者直译或意译,以及表达时语言的选择和应用都受到语境的制约,需考虑翻译的目的、典故所在文本的类型、译文读者的类型、何种语体(书面或口头)以及每个策略在具体语境中的优劣等等因素。

如对“一枕黄粱”的翻译,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选择上的差别:外文版和黄龙版两种译本选择直译,特点是形象直接,强调其指称意义,再配合注释的使用,则能够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让西方读者更多地了解汉语中的典故。但同时也正是注释的使用,使得译文难免显得冗长拖沓,尤其是对于诗歌这种讲求精练的体裁来说,更会打断读者的思绪;而赵甄陶版和许渊冲版两种译本选择意译,强调其语用意义,能够让读者一目了然明白其中的含义,在欣赏时也能保持阅读和思维的连贯性。但从文化翻译的角度来说,则完全“稀释”了这个汉语典故,丧失了传递文化的功能,留有遗憾。

三、语境和文化对典故翻译的影响

奈达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中强调翻译是一种意义翻译与文化交流。由于东西方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多数文字符号有两种甚至多种意义。对于意义的翻译不仅要依凭其所在的文本,即语言语境,更要考虑非语言语境,即社会文化。在翻译典故时,典故原文的语境和译文的语境往往差别很大,因此典故原语语境的原文读者和译文语境的译文读者对文字符号意义的理解不可能相同。即便是同一原文的多种译本,由于翻译目的的不同,不同的译者对文字符号意义的表达同样也会有所差别。因此,在典故翻译的过程中采取什么翻译策略都受到语境的制约,为了达到译语和文化交流的目的,译者应该设法消除障碍,将文化交流过程中信息的失真减少到最小。

根据 Peter Newmark 的定义^[7],文化以特定的语言作为表达媒介,体现其社会群落所在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产物。在翻译活动中,语言和文化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密不可分,翻译与文化息息相关。从文化层面上研究翻译策略,通常有“归化”或“异化”两

种。所谓“归化”是指以译入语为中心,以符合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为原则的翻译活动。而“异化”则是以原语文本为中心,竭力再现原语文本中体现的文化现象和特色,这两种都是走向极端的文化翻译策略。就典故的翻译而言,完全“异化”的译文似乎较难为译语读者所接受;而完全“归化”的翻译又难以做到文化传播,有悖于促进文化交流的初衷。除非在原语与译语之间有相当程度的文化共性,否则我们不得不在这两难中寻求一个可以接受的平衡点。^[8]

典故的翻译,确是汉诗英译的一大难题。对于精练浓缩的汉语典故,英译确实很难做到汉语中那样巧妙,尤其对于使用在诗词之中的典故,翻译时不能仅考虑典故本身的翻译,还要顾及诗词的韵、意等的翻译,因此要做到各方面兼顾的确很难。虽然对于毛诗中的典故的翻译,不同的译本之间似乎有一些规律,但是从文化翻译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又存在差别。正如吕叔湘说:“译事之不能不有变通,最明显之例为典故。”至于如何变通,则由译者的不同而因人而异了。如何能在有限的诗句之内,将典故中所蕴涵的中国文化背景传递给外国的读者,始终是汉诗英译的一大挑战。

参考文献:

- [1] 张智中. 毛泽东诗词英译比较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290-316.
- [2] 毛泽东诗词英译小组. 毛泽东诗词(汉英对照)[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1999.
- [3] 赵甄陶. 毛泽东诗词(英译本)[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 [4] 黄龙. 毛泽东诗词英译本[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3.
- [5] 许渊冲. 精选毛泽东诗词与诗意画(英汉对照)[M].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6.
- [6] 林煌天. 中国翻译词典[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133.
- [7] 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Hertfordshire: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UK) Ltd, 1988: 94.
- [8] 陈刚, 藤超. 从语用和文化角度看比喻翻译[J]. 外语研究, 2002(1).

责任编辑:卫 华